

# 小鲍惠尔和他的藏书票

■王波

楚,但很可能是与中国有关的老物件。他1953年离开中国带走了不少东西,包括老鲍惠尔留下来的4300多册书,据说那是当时“亚洲最好的英文图书文献收藏之一”。而另一位案件当事人、《密勒氏评论报》的副主编舒曼在1963年回到中国,改名舒子章,成为《北京周报》的外国专家,后来参与创办《中国日报》,1995年逝于北京。

小鲍惠尔的夫人于2004年去世,小鲍惠尔也在2008年离世。他至死坚信美军确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向朝鲜和中国北部地区投放了细菌武器;同时认为,在1945到1946年间,以及1949年前夕,美国有两个绝佳的窗口期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对话合作,《密勒氏评论报》为此提供了很好的信息平台,但美国政府领导人没有把握住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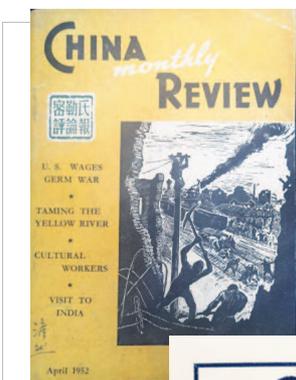
回头再来看这款藏书票,它由谁设计制作,诞生于何时?从目前能搜寻到的资料看,小鲍惠尔没有留下任何直接材料。但在翻阅《密勒氏评论报》影印本的过程中,我发现从1949年开始,杂志中出现了不少与这款藏书票风格类似的剪纸插图,以西北劳动者为物象,展示他们劳动、读书、集会、庆典的场景。除此之外,《密勒氏评论报》分数期专题介绍了中国剪纸,有几期封面和封底也是剪纸图案。显然,作为主编和出版人的小鲍惠尔对表现中国劳动人民形象的剪纸青睐有加。据此推测,极有可能小鲍惠尔在编辑过程中,为自己选了一幅有读书元素的剪纸做藏书票。如果这个判断能够成立的话,这款藏书票初始使用时间就在1950年前后,它也应该是最早的以中国剪纸为艺术表达方式的藏书票。

我在一家专营社会运动类旧书的美国网店(实体店就在小鲍惠尔居住的旧金山)上看过一些贴着这款藏书票的英文书籍,出版时间跨度从上个世纪初到1980年代。很希望这批书能够完好保存下去,以纪念这位今年正好诞生100周年的上海老朋友。

19世纪末、20世纪初藏书票传到中国之后,画面上逐渐开始出现中国元素,包括龙凤纹饰、山水亭台、汉魏石刻等,大概体现了中西知识分子在汉化或东方化西方文图艺术上的文化自觉、文化认同或者是文化猎奇。这张藏书票画面以剪纸呈现,两位陕北打扮的男女席地而坐,耕作的锄头和喝水的碗罐放在一边,合看一份书报,描绘陕北劳动人民接受知识启蒙,明显具有红色革命特征。画面之下,是英语写就的“比尔·鲍惠尔藏书”。土洋结合,甚是特别。

藏书票的主人比尔·鲍惠尔全名叫约翰·威廉·鲍惠尔,身边的人总叫他比尔,1919年出生于上海,距今正好100年。比尔的父亲约翰·本杰明·鲍惠尔是英文中国新闻杂志《密勒氏评论报》的联合创始人和第二任老板。这份编辑部位于上海延安东路160号泰晤士大楼二楼的刊物英文名改过六次,但中文名一直保持不变,用的是创始人及第一任老板詹姆斯·密勒的名字。如果大家对它没什么印象的话,一定知道《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以及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斯诺夫妇、史沫特莱在中国的身份就是《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而且他们与密勒、鲍惠尔一样,都是从密苏里州走出来的新闻人,俗称“密苏里新闻帮”。当然,《密勒氏评论报》的历史贡献并非仅仅与中国共产党为善,在1917年到1953年这30多年的岁月里,它客观详实地记载着中国发生的变化,成为极为重要的近代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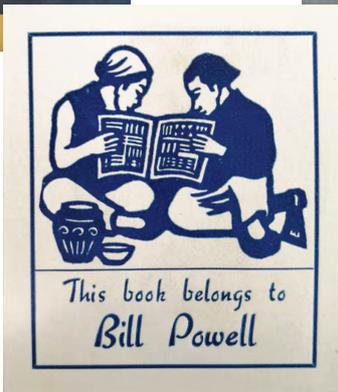
比尔·鲍惠尔是《密勒氏评论报》的第三任老板,从1945年复刊,到1953年终刊。据老鲍惠尔的自传《在中国二十五年》中文译者,同样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尹雪曼介绍,鲍惠尔父子政治观点差别很大,老鲍惠尔亲国民党,而小鲍惠尔亲共产党,因此《密勒氏评论报》在第三个阶段呈现的立场与前期有所不同。尹雪曼自己回忆的一段往事,现在看来颇有些矫情,恐怕



鲍惠尔  
▲小鲍惠尔的藏书票  
▲在上海工作中的小鲍惠尔



▲刊载美国细菌战报道的《密勒氏评论报》



也不符合学术研究求真的精神。他1962年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以《密勒氏评论报》为研究主题进行硕士论文答辩时,研究材料中涉及到一些内容应当与小鲍惠尔求证,老鲍惠尔的夫人也在给尹雪曼的回信中建议去问问她的儿子,但尹雪曼以政治立场不同表示“不屑于跟一位左倾幼稚病患者通信”。(《在中国二十五年》译者前言)

小鲍惠尔的名字被美国人熟知,是他1953年返回美国旧金山居住之后,与美国政府之间的抵牾,以及惹上的官司。由于《密勒氏评论报》在1952年前后多次报道美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美国政府向小鲍惠尔、他的妻子西尔维娅,以及杂志副主编朱利安·舒曼提出包括煽动罪、叛国罪在内的13项指控,主要依据是《密勒氏评论报》“错误报道了”所谓美军在

抗美援朝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以及美军在朝俘虏所声称的“朝鲜强迫战俘阅读《密勒氏评论报》”等。

这些指控涉及美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究竟有没有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问题,以及小鲍惠尔和他的《密勒氏评论报》所持的立场、宗旨,新闻言论自由的边界等法律问题。上世纪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当道,小鲍惠尔等人吃了不少苦头。作为资深新闻人的他们根本找不到本行工作,只能打些零工过活。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一些美国左派人士给予了小鲍惠尔弥足珍贵的帮助。而大洋彼岸的中国政府也非常给力。从1956年小鲍惠尔等人正式遭到起诉,至1961年美国司法部长批准取消指控,《人民日报》一共登载了16篇文章声援小鲍惠尔。

值得一提的细节还包括,在

诉讼过程中小鲍惠尔的律师提出要到中国取证,但根据国际法,跨国有效取证的前提是两国建立了司法协助制度。当时中美之间剑拔弩张,根本没有良性的外交关系。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支持小鲍惠尔,中国政府还是在1957年主动向美方提出建立司法协助制度的建议。之后,在两国协商未果,美国政府给小鲍惠尔的辩护律师仅仅发放了“在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部分地区”签证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依然让辩护律师入关,并向其展示美军曾使用细菌武器等一系列证据。(参见张再、周溢洪:《“鲍惠尔案”与中美司法协助谈判》)

历时五年,美联邦法院最终做出了有利于小鲍惠尔的认定,美国政府撤销了对《密勒氏评论报》三人的全部指控。生活相对安定下来,小鲍惠尔夫妇在旧金山开了个古董店,具体卖什么不清

## 《野望》

王绩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王绩是由隋入唐的大诗人,在齐梁宫体诗盛行的年代,可谓独树一帜了。可以这样说,他对唐代诗歌风格的形成是有贡献的。这首诗是王绩的代表作,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其一,在题材方面,隋代无律诗,而王绩作为隋末唐初的诗人,律诗写得中规中矩,平仄、对粘、对仗、用韵,运用十分自如。在他那个年代,很少有诗人做到这一点。闻一多说:“此诗得陶诗之神,而摆脱了它的古风形式,应该说是唐代五律的开新之作。”施蛰存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说:“唐代以前,还没有‘律诗’,王绩这一首诗是最早的唐代律诗。”其二,是在风格方面所体现的新特点。王尧衢说它“格调最清”,陆时雍说它“多于朴茂”(质

## “我”注唐诗

# 《从军行》的主题是反战

■胡中行

朴而繁茂),李攀龙说它“浅而不薄”,指向都是与齐梁宫体诗划清界限。所以,他的作品就能特立独行于隋唐之际:“王无功以真率疏淡之格,入初唐诸家中,如鸾凤群飞,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翁方纲语)王绩的诗歌风格,渊源自明,也就是学陶而入律。陶渊明诗歌的最大特点是“平淡”二字,王绩可说是得其真髓的。《唐诗矩》说:“前写野望之景,结处方露己意。结法深厚。三、四喻时值衰晚,此天地闭、贤人隐之象(征兆)也。故末寄怀《采薇》(诗经名篇),盖欲追踪夷(伯夷)、齐(叔齐)之意,然含蓄深深,不露线索,结法深厚。”这不就是陶渊明么?顾随先生说得好:

——“欲何依”三字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亦即寂寞心。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是内外一致,写物即写其心,寂寞、悲哀、凄凉、跳动的心。

——“牧人驱犊返”,多么自在;“猎马带禽归”,多么英俊!

## 《从军行》之四

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某次,章培恒先生对我说,有位日本教授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就是王昌龄《从军行》之四的主题是反战的。他表示赞同。在先生面前我不敢说,其实我平时上课正是这么讲的。

这一首诗,历来把它解读成豪情万丈的爱国主义诗篇,其实可能并不符合王昌龄的原意。固然,我们可以把这首诗的末两句理解为:历经百战,金甲磨破,不打败敌人绝不回家。但同样也可以理解为:历经百战,金甲磨破,不打败敌人还是回不了家。两种解释孰是孰非?这就要从全诗的用词造语所营造的气氛意境入手了,再看这首诗,诗人连用长云(乌云)、暗、孤城、遥望等词汇,着意营造的是战士远离亲人、久滞沙场的孤独感,而不是高昂的战斗激情。再结合诗人的其他几首从军行,看看他对战争究竟抱的是什么态度: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上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其一);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其二);关城榆叶早疏黄,日暮云沙古战场。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兵士哭龙荒。(其三);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北山南总是烽。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其七);所以,从总体上说,王昌龄的思想倾向应该是反战厌战的。